

〈論 説〉

族际社会中的文化建构

——以湘西方言中“苗”的话语实践为例

张 龙*

摘要：湘西是一个以汉族、土家族和苗族为主体的族际社会，在当地的方言中作为民族称谓的“苗”被赋予了民族以外的更多含义。本文分析了这一语言文化的具体意义、使用方法及其变迁。提出“苗”的话语实践是在当地各族交流互动过程中形成的文化建构，并对当地各族互动中的文化建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所反映的当代中国社会中的“民族”状况进行了一定的分析。

要旨：湘西は、民族社会であり、漢族とトゥチャとミャオ族を主体としている。この地方の方言で「ミャオ」という民族呼称は、民族以外の多くの意味を与えられている。本稿では、この言語と文化の具体的な意味、使用方法およびその変遷を分析している。「ミャオ」という言葉の実用例は、地域社会の相互作用の過程で形成される文化的構造から出たものである。また、当地における民族間交流の文化構築過程とその過程に反映された現代中国社会における「民族」の状況を分析する。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费孝通，1980），各民族以“大杂居、小聚居”的方式生活和相互交往。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以及少数民族之间存在混居的状况（屠凯，2014）。这意味着在承认各民族在生存与发展中创造了独特的文化，是中国衣食住行等方面文化多元表现的重要内容时，我们也要注意

一定地域内的混居意味着族际间产生着联系与互动，进行着文化上的交流、影响与借鉴。同时，族际社会中的交往还可能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而创造出全新的文化内容。

当代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转型，人们的社会活动空间和社会交往半径因为社会政策转变、科学技术进步以及基础设施完善等原因正迅速扩大。对于民族来说，与其他民族的交往正变得不可避免且日益频繁。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简称湘西州）位于湖南省西北部，与湖北、重庆和贵州等地相接，在其周边有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松桃苗族自治县及麻阳苗族自治县等民族聚居地区。州内共有人口298万，少数民族占80%¹，其中绝大部分是土家族和苗族，因此是一个以汉族、土家族和苗族为主体的族际社会。主要语言有普通话、方言、土家语和苗语，其中前两者是通用语言²。在当地的方言中，“苗”字有一个特殊用法，用以指代“落伍、过时”的意思。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这一用法的变迁及现状，探讨当前族际社会中通过各族互动实现的文化建构过程，以期增进对当代中国社会中的“民族”问题的理解。

一、相关研究回顾

语言是文化资源，反映群体和个人的分类方式、情感、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其既是社会结构，又是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纳日碧力戈，2010: 3）。因此从语言文化的角度分析话语实践可以让我们了解到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在生活、生产和社会交往等方面所具有的特点。湘西地区方言中对“苗”的使用方式是否是其本身的含义之一呢？

（一）“苗”字含义及其变迁

《说文解字》上对“苗”的解释是“草生于田者。从草，从田”（许慎，2004: 23）。《辞海》对“苗”的解释有：“①禾类植物开花结实以前的名称。……②一般植物初生时的名称。……③指事情的因由、端倪或略微显露的

迹象。……④苗裔。……⑤夏季的田猎。……⑥民众。……⑦亦称“有苗”、“三苗”。古族名。⑧中国少数民族名。⑨姓”（夏征农、陈至立主编，2010: 1306）。可以说从词义现状的层面看，虽然“苗”字有多种含义，但我们在对其的使用及解释时并不包括“落伍、过时”的意思。

从历史上看，“苗”字用来指代或形容人群的意思可以追溯至远古时代对“三苗”的记载。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提到：“舜、禹征三苗，屡见尚书、战国策、墨子、荀子、韩非子、贾子新书、淮南子、盐铁论、说苑诸书”（钱穆，1996: 15）。按照其字义发展变迁的历史，可以分为秦汉、唐宋、明清和建国后四个阶段。

秦汉以前“苗”字出现的主要形式是“三苗”、“有苗”等，《战国策》秦策与魏策中有“舜伐三苗”和“禹攻三苗”的记载。《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提到“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韩兆琦译注，2007: 199），记录了当时“三苗氏”所处的地理位置。在这一时期，“苗”字的意思主要是“部落”。秦汉之后直至隋唐，“苗”字出现的很少，之前出现的“三苗”多混于“蛮”、“夷”等称谓之中（石建华、伍贤佑主编，2008: 35）。

唐宋时期，出现了“三苗”、“苗众”、“苗人”等用法，主要意思是“地域”或“族群”。如唐《蛮书》卷十提到“黔、涇、巴、夏，四邑苗众”（苗族简史编写组，1985: 5）。宋代朱熹《记三苗》中亦有“近年……边患多出于苗”（石建华、伍贤佑主编，2008: 36）的记载。

明清时期，由于苗族发展壮大，逐渐为人所知，“苗”这一称谓也常用来指代与苗族毗邻而居的其他少数民族，因此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部分少数民族的统称（苗族简史编写组，1985: 5-6）。“《大明一统志》一百十卷始见‘苗族’一词。但仍有以‘苗’代‘蛮’的含混称谓”（石建华、伍贤佑主编，2008: 36）。另一方面，从苗族的称谓上来看，常以服饰颜色、习俗和居住地域的不同来命名，“或按自称，或按服饰、地区、居住条件，或接受土司管辖的情况……一直沿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石建华、伍贤佑主编，2008: 36）。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才正式确定“苗”字作为苗族统一称谓（杨圣敏，2003: 379）。

通过对“苗”字含义历史演变的简单梳理可以发现，其含义由“部落”逐渐转向“地域”或“族群”，最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确定为民族称谓。可以说无论是从现有词义还是历史变迁的角度看，“苗”字都不包含“落伍、过时”的意思。

（二）民族称谓的相关研究

在“苗”字本身并不包含这一层含义，而苗族是湘西地区主要民族之一的情况下，值得我们注意和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一用法是否来自对民族称谓的使用。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之间的交往是学界探讨的重要议题，在民族称谓的使用这方面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关注。有研究者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了民族称谓所用字词的含义及其变动。也有研究者关注到了具体地方环境下某一民族称谓的特殊使用现象。

一方面，研究者考察了我国民族称谓用语历史上的形成与发展变化过程，提出最早对周边少数民族的称呼多加以虫、兽意义的偏旁。这一实践虽然体现了各民族不同的图腾崇拜文化，但一定意义上代表了王朝对周边少数民族的蔑视（韩忠太，2001；何俊芳，2005：91）。在此基础上，有研究者对近代中国社会民族称谓用语的变迁过程进行了回顾。王兴瑞认为调整民族间关系的基本前提是改变当时对少数民族的蔑视态度，由此实现变差异为一体（王兴瑞，1948）。楼品贵梳理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中国对待少数民族的态度变化，认为从主张废除民族称谓到各族精英提出修改民族称谓中带有贬义色彩的字形这一过程是建立在抵御外侮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基础上的必然选择（娄贵品，2013）。杨思机在介绍近代中国社会“汉人化”和“民族化”理论争论的基础上，提出少数民族的虫兽偏旁除了蔑视的含义以外，还有种族来源说、环境习俗说和图腾信仰说等来源，因此不能一概而论。而国民政府改正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虫兽偏旁命名的实践体现了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以及国外民族理论的影响（杨思机，2014）。从这方面的研究来看，学界已经注意到民族称谓作为语言符号所具有的表达价值、情感及区分我群和他群等方面的作用。

另一方面，由于民族之间存在语言、习俗等差异，在多民族混居的情况下有可能出现交流不畅的现象，这对族际间的互动与交流带来了一定障碍。一些研究者在实地调查过程中发现某些地方会赋予当地某个民族称谓以更多的含义。被赋予的这一含义以当地族际间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差异为基础，是限于当地人使用的地方性知识。李蓝在对贵州汉族语言的考察中提到汉语语音和语法并没有受到当地少数民族的影响，但词汇上已经体现出多民族聚居的特点：其一是将一些少数民族使用的地名吸纳到汉语中；其二是借用了一些少数民族语言中的词汇；其三是将民族称谓用来指代性格上脾气火爆、不变通或行为举止奇怪、他人难以理解的特点。这种现象被其称作民族称谓词意义的泛化（李蓝，1999）。黄文富在对广西一个县域范围内壮族对汉族和瑶族称谓的变迁过程考察的基础上，提出当地壮族对汉族和瑶族的称呼带有戏谑、调侃的成分。其更进一步分析了在民族交流增加、生产生活条件逐渐趋同的社会背景下，这一称呼中的戏谑意义逐渐褪去，成为中性的民族指代词。这是当地各民族话语表达系统不断发展的表现，体现了民族生活状况的发展变化以及多民族聚居中话语权力和情感指向的发生与消解（黄文富，2009）。从这一角度看，研究者注意到了民族称谓词被用来指代任何与这一民族相关的语言、器具和性格等，甚至被用来指代包含其他民族在内的众多事物的现象。

已有研究从历史和现状两方面对民族称谓的用语进行了探讨。研究者注意到了民族称谓作为语言文化所具有的表意性，探讨了特定社会背景下具有明确目的性的表意尝试；以及作为日常话语实践所具有的索引性，将民族称谓视作对性格、爱好及行为方式等方面特征的概括。但现有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现有研究在探讨民族称谓的话语实践时大多从心理学寻求解释。研究者从观念的角度分析人们对于不同民族的主观认知，提出民族刻板印象、民族偏见是族际交往中的常见现象，而刻板印象建立以后有可能导致偏见与歧视，并最终引起排斥行为（何莹等，2011；苏昊，2014）。刻板印象或污名理论固然是我们理解民族称谓话语实践及族际关系的一个进路。但作为一种语言文化或日常话语实践，人们对民族称谓的使用常常如涂

尔干所说“社会事实”般，具有超越个体心理活动的性质。因此理解其作为社会现象的形成和变迁过程，对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社会以及其中的民族所发生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研究者在探讨民族称谓的语言文化及其实践时，往往立足于民族平等的立场，探讨族际间的交流与融合使民族称谓摆脱负面含义的可能性、重要性以及具体实现方式。民族平等这一立场并没有错，是族际互动与交流中的基本原则之一。但研究者在这一立场的影响下形成了对“民族称谓先被赋予负面含义，随后在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中再被去掉负面含义，从而回归纯粹的民族指代”这一认识路径的依赖。这在一定程度上无法反映当前中国社会中剧烈转型下的现实状况，如同本文将要讨论的，湘西地区“苗”这一语言文化被建构起来之后，被赋予的含义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而非完全依附于民族称谓之上。变迁带来的结果也并非负面含义的消失，而是二者分离，变为相互独立的日常话语实践。因此这一语言文化的变迁可能并非一个简单去污名化的过程，而是具有一定的具体性与特殊性。

本文认为，社会交往等生活实践受到精力、时间、交通通讯技术及制度环境等方面的影响因而是有限的，一定地域范围内的有限社会交往使得这一地区的社会实践具有地方性和情境性的特点。地域性的时代和社会背景的变化会使得影响方言的客观条件发生变迁，导致方言词汇或意义的改变。因此地域性社会发展变迁的历史有可能在方言上留下痕迹。通过分析日常生活中某些词语的使用，我们能够从一个侧面探讨当地社会发展变迁的现象及过程。正如有研究者所说“词义体系的历史是反映人类时代风情的博物院”（马清华，2005：4）。因此看待语言要超越语词本身，不能脱离使用这一语言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历史等维度来单独寻找语词所代表意义的答案，而是应该强调语言在社会中的嵌入性，即在强调个体能动性的同时，把语言看作社会结构驱动的话语实践。只有将语言及其社会和时代背景整合起来考虑，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一语言的形成、变化及当前的意义。民族称谓用语被赋予另一层含义的行为可以理解为特定地方情境中人们的文化建构实践，这一实践以本地的历史变迁脉络和社会发展现实状况为基础，具有历史中的延

续性和地方环境中的特殊性。因此探讨这一文化的建构和变迁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社会中的“民族”状态，以及族际社会中的文化互动。通过对湘西“苗”的语言文化的介绍与分析，本文希望能丰富我们在这一方面的认识。

二、湘西的“苗”

湘西地区“苗”的语言文化并非最近才出现，早在20世纪上半叶就见于文字记载，具体的使用有可能追溯至更早的明清时期，但其含义与当前的使用习惯已有较大的不同。当地早期“苗”字用法的来源是苗族称谓，体现了当地族际互动中的污名现象。但随着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变迁，当前人们对“苗”的使用已经发展为两种相互独立，不相关联的话语实践。

（一）湘西“苗”的早期用法

至少在民国时期，湘西地区对“苗”的使用已见于文字记载，石宏规在对这一族际社会的考察中提到：“然按说文‘草生于田谷曰苗’，又云植物初生亦曰苗，则以苗字名族之义，实显示其民族躬耕力田，以农业为生活之根本，并无鄙视及阶级畛域之见存乎间！今人昧于古义，常以苗字讥人，而苗族亦以为不美之名，讳莫如深，吁，何其缪也”（石宏规，1933）。可见在民国，甚至有可能早至明清时期，湘西地区在使用“苗”的时候带有对苗族的蔑视含义，将“苗”用于形容人时带有讥笑、讽刺的态度。而当地苗族对此也有所了解，他们被动地接受了这一变化，但是在自身的日常生活实践中抵触和排斥这一用法。

这一含义的出现与明清时期当地的族际关系相关。在民族压迫时期，土家人为了避免被压迫，并未明确区分自身与汉族的区别，因此没有表明自己的民族身份（费孝通，1980），而清代政府似乎有意联合湘西的土家人来控制苗族，以期巩固其统治地位（屠凯，2014）。一方面这加剧了土家人与苗

族的紧张关系，另一方面则导致土家人与苗族在社会生活和发展上产生了差距。改土归流以后，湘西土家人考取功名以及在当地任行政职务的情况较为普遍，以至于在民国时期，“土家人当伪专员、伪县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及保甲人员也是数不清的”（中央土家问题调查组，2003）。1956年时任政协委员的潘光旦到湘西视察，通过听汇报、座谈及访谈等方式对当地族际关系进行了了解，提出当地土汉、土苗的关系从历史上看并不好，土家与苗族之间存在着相互歧视的现象。而从实际发展状况看，湘西土家聚居区的人口更多，面积更大，物产更丰富（潘光旦，2003）。在这样的背景下，“苗”逐渐兼具了指代苗族的称谓以及对苗族聚居地较为落后的社会发展状况的概括两层含义。

（二）“苗”的使用与含义的变迁

湘西“苗”的早期用法中带有对苗族的蔑视，但在当代社会生活中，这种含义已经经历了较大的变迁。这一变迁表现为继承和变动两个方面。继承意味着当前“苗”的使用一定程度上还能找到最初指代民族时的痕迹，变动则意味着其能指、所指及其基础已经与过去不同。

1. 老年与青年对“苗”的认知差异

作为一种语言文化，“苗”反映了湘西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些较为稳定的特点，因此一旦建立就将在一定时间内持续产生影响。从同期群的角度看，人们早期习得的关于“苗”的含义与用法将伴随他们的人生历程。因此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湘西方言中的“苗”仍能让人们联想起看待苗族时的蔑视观念。往往老年人对这一表述来源的解释更倾向于归结于民族称谓。如同一位苗族受访者所说：

我们所说的苗和苗族应该有联系。我爸（苗族）就很介意别人说这个词，如果有苗族人说这个词他会觉得这是不尊重我们自己的民族。有时候我说了这个词，如果被他知道的话就会骂我。

（被访者 OX，女，苗族，24岁）

由于湘西是一个族际社会，“苗”这个用法的产生与族际间的互动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湘西地区的苗族也了解“苗”这一用法的含义与所指。从访谈对象的回应可以看出，其父辈对于这一方言与民族之间的联系有清楚的认识，他们自我认同苗族，并且出于自尊心而拒绝使用“苗”这一用法。而对于“苗”与民族的联系，当地土家族的回应比如：

问：你怎么知道一开始“苗”是指的苗族人呢？

WYS：以前小时候，大人都告诉我说你不要当着乡里那些苗族人的面说“苗子”、“好苗”这些话。这就算是一种佐证了吧。

问：当着他们面说这种话会怎么样呢？

WYS：我没试过，不知道会怎么样。听说会很生气。

（被访者 WYS，男，土家族，25岁）

相比之下更为直接的表述如：

ZYC：苗的意思就是对苗族名称的贬义看法。看到苗族人，（听到有人说苗话，（看到有人）穿着苗族的服装的时候感觉土里土气的。

（被访者 ZYC，女，土家族，60岁）

被访者所表示的“从父母、大人口中了解到”以及老人的回答都说明湘西方言中的“苗”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早期所含有的蔑视意义。在一部分人，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看来，“苗”字身上仍能找到与民族产生的联系。这体现了“苗”作为一种文化建构在地域社会中一定程度上所具有的稳定性。那么当地年轻人是如何看待这个词的呢？我们先看几段当地年轻人的解释：

问：为什么不穿民族服饰呢？

YXF：就是穿了民族服饰以后就有点太引人注目了。之后，问题是…有点苗。

问：这个苗你是怎么理解的？

YXF：就是太具有乡土气息了，就像农村里面才穿的，就是比较封闭的地方。我们地方的口语。

（被访者 YXF，女，土家族，25岁）

问：这个苗是什么意思呢？

XW：就是款式不新颖、不时尚嘛，而且有些做工也很差。

（被访者 XW，女，土家族，24岁）

这个苗不一定是苗族嘛，我不是这样理解的。苗就是好落后，好过时，也就是说不和现代社会相接轨。也就是这些人认为现代社会的文化是一种先进文化。我们应该普遍接受先进文化。……这确实是基于交通便利以后，山里头的人看到了外部世界的一个先进和发达之后深感自己的落后。对于落后的东西人们总是一种鄙夷的心态。所以觉得好苗。

（被访者中，男，土家族，25岁）

其实我自己并不觉得这个词和苗族有关系，我和我的朋友们都会用这个词，但是不能被我爸他们知道。

（被访者 OX，女，苗族，24岁）

从被访者的这些回答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当代湘西地区年轻人中仍在使用“苗”这个词；另一方面与他们父辈所不同的是，他们在使用时对这个词的理解已经有了较大不同，其口中的“苗”不再和苗族产生联系，而是仅仅包含了负面的意义，比如被用以指“落伍、过时”的意思。另一个不同之处体现在使用群体范围的不同。早期湘西地区的苗族拒绝使用“苗”被赋予的贬低意义；而当代湘西社会中，上了年纪的苗族仍有人坚持不采纳的行为选择，但随着“苗”字意义的变化，苗族的年轻人中已经开始有人接受了这种用法，不再将“苗”的话语实践当作对自己民族的贬低。

通过大致归纳，可以如表 1 一般理解湘西地区两代人对于“苗”这一话语实践的认识。简单说来，湘西地区的“苗”字用法最早用于对苗族的贬低，之后开始指代与苗族相关的器物、语言或行为习惯。而到了当前阶段，50岁或更年长的人在对该一语言文化的使用上更倾向于将其与民族称谓相联系，体现这一话语实践在历史上的延续；而年轻人则倾向于认为“苗”的用法与民族无关，是方言中对于“落伍、过时”意义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

表 1：访谈对象中两代人对于“苗”的解释

	“苗”和苗族关系
父母辈（50~60岁）	“苗”与苗族相联系，就是对苗族称谓的贬义用法。
子女辈（30岁左右）	大部分人觉得“苗”与苗族之间没有联系。

2. “苗”的当代意义

既然湘西方言中“苗”的用法已经产生了变迁，年轻人已经开始不再将其理解为与民族联系的贬义词汇。那么他们在使用这个词时希望表达何种意义呢？从访谈对象的解释中可以归纳出如下几种：

第一，也是最主要的一种含义，即落伍、过时、没有创新。访谈对象大多认为“苗”的意思是形容一个人言谈举止不适应现代社会生活。如同前述被访者 ZH 的解释。与之相似，被访者 CNX（女，25 岁，土家族）提到：“‘苗’就是指一种未开化的状态，不发达的文明，我们说一个人好‘苗’，就是说这个人文化程度不高，有很野蛮的生活方式，不适应我们的现代文明”。从这方面看来，由于现代社会各方面的变化非常迅速，因此“苗”虽然用以表达“落伍、过时”的意义，但其所指的具体现象却是处在变动中的。十年前不会使用手机可能会被认为“苗”，而当前可能不会使用网络即时通讯软件就会被界定为“苗”。

第二，土气或俗气。“土”指的是土里土气，而“俗”则指的是庸俗，有时也指过于花哨或者不雅。如被访者 ZZ（女，33 岁，土家族）表示“‘苗’就是土的意思，看起来就是乡下来的”。而被访者 YXF 则提到“我不觉得‘苗’只局限在传统或过时的意思，现在有些人穿衣服也会给我感觉有点‘苗里苗气’。像有些就是穿得太花里胡哨，尤其是颜色搭配的非常不好看我就会觉得还挺‘苗’的”。

那么在当代湘西年轻人的话语实践中，“苗”通常用于什么场合、又用于指哪些内容呢？首先是穿着方面，由于我们对于一个人的观察，首先注意到的就是其外在表现，因此服饰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对其的评价。在访谈对象的叙述中，服饰对于一个人“苗”与否的界定具有重要作用。其次是语言方面，湘西地区使用普通话和方言作为官方和日常生活的通用语言。虽然

土家族和苗族都有各自的语言，但在访谈对象的印象中只有农村里还保留了使用民族语言交流的习惯。城市里由于族际间的交往更加频密，如果在与他人交流中使用民族语言会被认为没有融入现代社会生活。同时在语词方面，如果在交流中使用的词汇是几年前的流行语，这样也会被认为与社会脱节而被形容为“苗”。再次是行为举止方面，访谈对象谈到如果生活中遇到不按社会规范行事、不懂办事程序的人，就会加以“苗”的评价。总体而言，当代湘西地区年轻人对“苗”的认知以现代社会生活的正常进行为参照标准，一个人的穿着、言谈和行为举止要与现代社会生活相适应。如果显得格格不入，比如在大家普遍穿着现代流行服饰而有人穿着民族服饰，或者公共场合有人不合时宜地大声喧哗或打闹时，“苗”的语言文化就有了表达其意义的场合。

三、特定社会背景下的文化建构

语言的使用既具有个体性，也具有社会性的（孙长彦，2009: 56）。方言从发音、词汇的意义及使用方式等方面体现一个地区的具体性与独特性。从湘西方言中“苗”的词义变迁及当代用法可以看出，与之前研究者所提到的不同，“苗”的发展趋势并非是在赋予负面含义以后再去除掉这些负面含义。湘西“苗”的话语实践最初指民族称谓，其后被赋予了蔑视和贬低的意义。在当前的发展变迁过程中，“苗”仍然被用来指代一些带有负面评价的含义，如“落伍、过时”，但已不再用于指代民族。作为负面评价的“苗”和作为民族称谓的“苗”独立开来成为两个互不相关的语言文化。换句话说，在民族称谓词的具体使用中，被赋予的含义并不一定是依附于民族之上的，而是可能在特定情境下具有自身的独立性。

语词的含义随社会发展变迁而不断变动这一过程意味着湘西方言中的“苗”是当地各民族在互动过程中不断赋予意义而建立起来的文化现象。一定时代背景下其具有地方社会中的稳定性，但从历史的发展进程看，其是处在变动中、符合人们社会生活的文化实践。

湘西方言中“苗”的产生及意义的变迁并非得力于某一民族的单独作用，而是族际社会中不同民族交流互动的结果。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不同的互动模式产生的不同结果影响了“苗”的意义变迁。一方面，这一话语实践出自于早期的民族隔阂。从明清时期看，湘西一直是后发展的民族地区，丘陵地形也不利于相互间的交流。同时，统治者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也一定程度上挑起了民族间的矛盾（花垣县志编纂委员会，1993: 561），因此族际之间较为缺乏能够增进相互了解的交流。在沟通渠道不畅的情况下，民族之间容易因为生活方式及观念习俗的不一致而产生互相的隔离与排斥，导致我群、他群意识以及民族边界的强化（马成俊，2014）。从而产生以民族称谓指代自己难以理解的生活方式或行为习惯等现象。

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社会正在经历高速增长以及科技日新月异的更新等过程，在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的现代化进程中，湘西各民族的日常生活日益趋同。类似民族服饰、语言和行为习惯等以前属于社会强制要求的规范在当代社会中越来越成为个体可以进行选择的文化要素。节庆或婚礼期间身着其他民族服饰的行为也变得常见起来。城市化的快速扩张带来的影响之一则是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被纳入现代社会生活的潮流之中。在早期的实践中，民族身份大致可以视作与权力结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等方面相关的划分条件；但在当前社会生活逐渐趋同的前提下，土家族或苗族的民族身份越来越难以作为现代社会中区分本质性差异的标准。如受访者 XW 提到：“真的少数民族聚居地我感觉没有去过，因为我们这边（湘西）已经完全不像少数民族聚居地了。……电视里面经常会出现（宣传的）少数民族，比如学校里面的小朋友穿少数民族服装，那些衣服都是崭新的，肯定是新做的，一看就假的不得了”。语义的变迁不是随意的，而是根植于人们的日常经历与生活经验。在日常生活中民族身份越来越淡化的背景下，湘西地区的族际互动中也相应地弱化了对于民族身份的强调。“苗”的话语实践逐渐不再与民族相联系，而是成为与“落伍、过时”同样意义的形容词。正是在作为民族的“苗”和作为“落伍、过时”的“苗”逐渐成为两个不同的、相互独立的语言文化的过程中，湘西地区苗族中的年轻人才开始改变了父母一辈所持

有的看法，在日常生活中渐渐接受了“苗”的文化与实践。由此在当前社会中，“苗”可以看作是一种权威的建构，这种建构的合法性并非来自于对某一个民族的蔑视与偏见，而是来自于湘西当地人对于日常的现代社会生活的精心追求。

在当前社会中，“现代社会生活”何以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以至于足以改变“苗”的话语实践？从衣食住行各方面，可以看到现代社会生活都在以一种全新的逻辑不断挑战着传统生活的逻辑。以时钟和手表等为代表的现代计时方式席卷了几乎所有城市和乡村，大众被卷入到一个更为广泛、更为精密且与世界其他地区相互联系的时间体系中。有关时间、日期的新的共识取代了我们之前的认识（周星，2005a）。与之类似，日常生活实践的方方面面都或多或少经历了现代性的转变。以往不同地域、不同具体社会中具有各自特点的生活方式，逐渐被统一的现代生活方式所取代。以往立足于各自民族历史和文化而形成的独特生活习惯，在其他民族看来往往是难以理解的，因此是需要用新的话语进行概括的；但受现代性影响而趋同的社会生活则消解了民族之间的这种不同。在这样的背景下，湘西地区各民族的日常生活逐渐变得越来越一致，且都以追求不断变化的现代社会生活为重要目标。

“苗”的文化和用法何以能在湘西传播开？换句话说，这样一个民族称谓的地方性用法是如何成为当地人的共识的呢？从访谈对象的回答看，其得知这一用法的途径有“一直就有的说法”、“大家都这么说”以及“父母告诉我的”等等。由此可见口耳相传的方式是“苗”得以建立起来的最主要途径。这意味着湘西地区各民族在互动中以一传十、十传百的方式逐渐扩散着“苗”的用法，并随着社会背景和各方面条件的变化一点点改变着这一语言文化的含义。在具有一定封闭性的地域环境中，各个行为主体对于“苗”的反复实践使得这一语言文化具有了地方情境中毋庸置疑的合理性。大家无需去讨论这一用法是否合理，也不用计较字典中是否有对这一用法的成文解释。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社会成员大致能够了解其产生和变化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基础，因而能够较为准确地把握其含义。最终，通过这种经验主义的方式建构起了广泛为人所认可和使用的语言文化。

高丙中认为族际社会中的互动将带来族际文化共享，包含作为知识、作为尝试和作为习惯三个方面（高丙中，1998）。“苗”即是湘西这一族际社会中各民族互动下建立起来的共享文化。通过对其的介绍和分析，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族际社会中通过不断互动而实现的文化建构过程，同时也了解了这一过程中湘西当地各民族的生活、发展状况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可以看出，这一建构过程是历时性的，在“苗”的语言文化建立起来以后，这一建构过程仍在通过人们的话语实践不断地进行，并随着社会发展和变迁不断改变着“苗”的意义与指向。同时，这一过程也是双向的，是个体能动和结构驱动并存的。被建构起来的作为文化的“苗”影响着湘西各民族间的关系及其日常生活实践；同时当地各民族的话语实践反过来也在不断地型塑着“苗”的文化内涵。

四、结语

赵旭东认为日常生活实践可能并不符合宏大理论的描述，对方言的分析能够体现地方场景下社会生活的实际意义（赵旭东，2006）。本文通过对湘西地区方言中“苗”的语言文化的分析，简单探讨了族际社会中通过互动实现的一个语言文化建立、改变并发挥作用的过程。本文提出，湘西的“苗”是建立在特定时代背景和经济、社会、文化等基础之上的话语实践，实质是在族际社会中通过互动进行的文化建构。在当代社会中这一建构的基础是湘西各民族对于现代社会生活的向往和迫切追求。与早期强调对民族生活方式和行为特征的负面归纳不同，当前这一建构的基础并不包含作为区分群体标准的民族身份。因此“苗”的话语实践在变迁过程中逐渐分为两个相互独立的部分：一方面，“苗”是民族称谓；另一方面，“苗”也是湘西方言中对“落伍、过时”等意思的表达，而这一表达中逐渐不再包括指代民族的意义。与之相伴随的是，湘西地区苗族中的年轻人也开始使用这一语言文化。

湘西“苗”的语言文化及其实践提醒我们在思考“当代中国的民族”这一主题时，要注意族际社会所具有的特点。在经典的国外民族理论中，民

族常常被视作一块政治单位中所有成员的集合（屠凯，2014）。经典理论中“民族”概念的形成和使用都与民族国家的构建相关，更多程度上指代“国族”（周平，2015）。但湘西的实际情况是汉族、土家族和苗族为主的各民族分散居住，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分布模式。这种模式一方面意味着国内的民族状况相较之下拥有具体社会环境中的复杂性。如同文中所分析到的，“苗”的变迁过程意味着中国的民族混居及其互动具有其历史和地域中的特殊性。另一方面，这一分布模式本身也意味着我们在探讨民族问题时，应考虑到族际社会的特点，更多关注民族间的交流、影响及文化上的借鉴，而非族别的历史与文化特殊性（周星，2005b）。这样，我们对于中国社会中的民族及民族文化或许能有更好的认识与了解。

注释：

*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社会学专业2015级博士生，日本爱知大学中国研究科中国研究专攻2017级博士生。

1 数据来源：湘西州人民政府网站，2017年。<http://www.xxzf.gov.cn/zjxx/>

2 湘西州各县市的方言在发音和语词上有细微的差别，但总体上不会影响交流。

参考文献

- [1] 费孝通，1980，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147-162.
- [2] 高丙中，1998，中国文化的族际共享，民族艺术（4）：54-70.
- [3] 韩兆琦译注，2007，史记，北京：中华书局。
- [4] 韩忠太，2001，论民族偏见，云南社会科学（4）：63-68.
- [5] 何俊芳，2005，语言人类学教程，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6] 何莹、赵永乐、郑涌，2011，民族刻板印象的研究与反思，贵州民族研究（6）：21-26.
- [7] 花垣县志编纂委员会，1993，花垣县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8] 黄文富，2009，对一些民族称谓语言民俗发生变迁的思考——以广西东兰县当地壮族人对汉、瑶民族的称谓语言为个案，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6）：17-20.
- [9] 李蓝，1999，贵州汉语受当地民族语影响三例，方言（2）：150-153.
- [10] 娄贵品，2013，国民政府改废少数民族称谓的历史考察，贵州民族研究（3）：134-137.
- [11] 马成俊，2014，弗雷德里克·巴斯与族群边界理论（代序言），西北民族研究（3）：167-172.

- [12] 马清华, 2005, 语义的多维研究, 北京: 语文出版社。
- [13] 苗族简史编写组, 1985, 苗族简史,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 [14] 纳日碧力戈, 2010, 语言人类学, 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 [15] 潘光旦, 2003, 访问湘西北土家的报告, 载彭振坤编, 历史的记忆,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参见屠凯, 2014,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考”, 载黄宗智主编, 中国乡村研究 (第十一辑),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52-268。
- [16] 钱穆, 1996, 国史大纲,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17] 石宏规, 1933, 湘西苗族考察纪要, 作者印行, 载李文海主编, 2014,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二编, 少数民族卷 (下),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408-430。
- [18] 石建华、伍贤佑主编, 2008, 湘西苗族百年实录, 北京: 方志出版社。
- [19] 苏昊, 2014, 维、汉大学生的民族刻板印象: 外显和内隐, 中国青年研究 (12): 20, 21-24。
- [20] 孙长彦, 2009, 语境奥秘的探究,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 [21] 屠凯, 2014,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考”, 载黄宗智主编, 中国乡村研究 (第十一辑),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52-268。
- [22] 王兴瑞, 1948, 海南岛之苗人, 珠海大学编辑委员会初版, 载李文海主编, 2014,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一编, 少数民族卷,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101-165。
- [23] 夏征农、陈至立主编, 2010, 辞海: 第六版缩印本,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 [24] 许慎, 2004, 说文解字校订本, 班吉庆、王剑、王华宝校点, 南京: 凤凰出版社。
- [25] 杨思机, 2014, 民国时期改正西南地区虫兽偏旁族类命名详论, 民族研究 (6): 76-93, 125。
- [26] 杨圣敏, 2003, 中国民族志,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27] 赵旭东, 2006, 中心的消解: 一个华北乡村庙会中的平权与等级, 社会科学 (6): 31-42。
- [28] 中央土家问题调查组, 2003, 关于土家问题的调查报告, 载彭振坤编, 历史的记忆,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参见屠凯, 2014,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考”, 载黄宗智主编, 中国乡村研究 (第十一辑),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52-268。
- [29] 周平, 2015, 当代中国族际关系的特点和走向, 学术界 (11): 5-20。
- [30] 周星, 2005a, 关于“时间”的民俗与文化, 西北民族研究 (2): 121-139。
- [31] ——, 2005b, 中国民族学的文化研究面临的基本问题, 开放时代 (5): 69-78。